

宋刻本版式设计的用尺标准

孙琬淑

(浙江外国语学院, 杭州 310012)

摘要: **目的** 探索宋代刻书中心刻本版式设计的基本用尺标准, 进而分析宋代雕版印刷规模化生产的通用性设计规制。**方法** 以设计学和类型学为理论依据, 通过现代版式设计方法, 以界行与版框为宋刻本版式内部分割与外部比例的设计标准, 建立基于宋寸的模块网格对宋刻本版式进行尺度比对分析。**结果** 以浙江地区、福建地区、四川地区为代表的宋代刻书中心地域刻本版式设计的基本用尺, 主要包括营造尺、浙尺、福建乡尺、太府尺、淮尺。**结论** 受宋室南迁、人口流动的多重因素影响, 宋代官尺与地方用尺通用并存在尺度比例关系。通过对宋代刻书中心刻本版式用尺标准的判定, 理解不同时空和不同出版机构宋刻本版式设计之间的地域性尺度关系。以宋代尺度系统的发展脉络来鉴别宋刻本的年代出处, 为宋刻本版式鉴定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思路, 拓展宋刻本版式设计的研究范畴。

关键词: 宋刻本; 版面范式设计; 界行; 版框尺寸; 用尺标准

中图分类号: TB4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21)24-0251-08

DOI: 10.19554/j.cnki.1001-3563.2021.24.030

The Ruler Standard in Layout Paradigm Design of Song Dynasty Block Printed Edition

SUN Wan-shu

(Zhejia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basic ruler standard for the layout design of block printing in the major book engraving centers of Song Dynasty, and then analyzes the universal design regulation of block printing in the Song Dynast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design and typology, through the modern layout design method, taking boundary line and chase as the design standards of internal division and external proportion of Song Dynasty block printed edition, a modular grid based on Song inch is established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layout of Song Dynasty block printed edition. Taking Zhejiang, Fujian, Sichuan as the representatives, the basic standard of layout design of block printed books in Song Dynasty mainly includes Yingzao ruler, Zhejiang ruler, Fujian Xiangchi, Taifu ruler and Huai ruler. Influenced by many factors such as the southward migration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flow of population, the official ruler and the local ruler were universal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re was a scale proportion relationship. Based on the judgment of the standard of using ruler for the layout of the central block printed edition of the major engraving books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geographical sca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ayout pattern design of song block printed edition in different time and space and different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can be understood. This paper uses the development of scale system in Song Dynasty to identify the age and origin of the printed version of the Song Dynasty, provides a new research idea for edition identification of Song Dynasty block printed edition, and expands the research scope of layout design of Song Dynasty block printed edition.

KEY WORDS: Song Dynasty block printed edition; layout paradigm design; boundary line; plate frame size; ruler standard

自“书同文、车同轨”, 秦制规范统一度量衡, 至宋, 量制承传隋唐之制, 雕版印刷逐步实现标准化

收稿日期: 2021-10-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 (2019CG04210)

作者简介: 孙琬淑 (1987—) 女, 山东人, 硕士, 浙江外国语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设计文化研究。

和规范化的生产发展。宋刻本作为古籍善本的典型代表,不仅是雕版印刷与蝴蝶装帧技术的客观产物,更是宋朝君王为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工具。北宋初期,为保障医术、儒家正史等用书的正确性,统治者规定相关书籍必须由政府机构才可出版流通。然而,宋代成熟的印刷技术已广泛普及^[1],私家刻书与民间书坊林立,具体表现为刻书印量大、地域广、种类多的特征。此时宋代刻本生产的重点是保障不同地域、不同出版机构印书生产的规模化与通用性。作为百物制度的生产标准,度量衡的尺度测量为雕版印刷的大量生产提供了技术基础。因此,宋刻本的版面设计离不开基本尺度度量衡的使用。然而,目前关于宋刻本版式的尺度研究多停留在对刻本行款及版框尺寸的著录上。因此,在现代设计语境下,笔者更想通过图像分析,探究其版面范式设计的用尺标准,进而分析不同地域宋代刻本版式内在的设计规范。

1 宋刻本版面设计的内在分割与外部比例

图书的版式决定了纸张的外部比例;网格决定了纸张的内部分割^[2]。宋刻本版式要素“界行”和“版框”是决定宋刻本版面范式设计的内部分割与外部比例的尺度标准。

宋刻本版面分行的黑线,源于古人于绢素上用的乌丝或朱丝织成的界行^[3],见图1(图片来源作者绘制)。这种直行格具有确定文字区域与字体大小的功能性作用,并辅助汉字纵向书写的整齐与美观性。界行的设计类似于现代主义网格设计中的基础线^[4],它辅助对齐版面元素,并有助于准确编排宋刻本版式中的文字、牌记、插图等设计要素。缪拉·布洛克曼在《平面设计中的网格系统:平面设计师、印刷商和三维设计者的视觉沟通手册》(1961年)提出网格要素可以用数学上的整数表示,“栏是版式的再分,边距和单元是栏的再分,基线是单元精确的等分。”姑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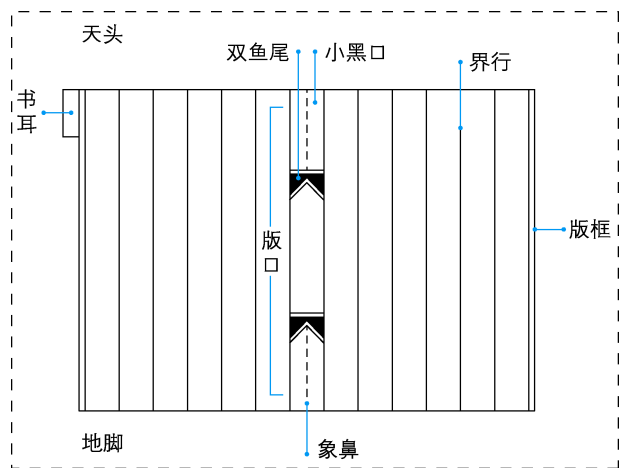


图1 宋刻本版式之界行与版框
Fig.1 The boundary line and chase of Song Dynasty block printed edition

不论数学几何的设计方法,界行作为版式的再分,界行之间的距离与字体大小有着密切的关系,界行的长度更受版式比例的外在制约。因此,作为一种显性可测量的网格基础线,界行是宋刻本版面设计内部分割的一种尺度标准。

由于我国古籍目录多标注版框尺寸,忽略了开本尺寸^[5],所以对宋刻本版式尺度的研究主要从版框高广的尺寸入手。宋刻本版面设计的版框元素是四周围合的边线,这种显性的版式比例规范了宋书幅面规格的大小,并直接反映在雕版印刷的印版规格。叶德辉言:古者简籍之式,木以一版为一桀^[6]。雕版印刷术是实现书籍大量流通与传播的技术保障。不同于活字印刷术,雕版印刷作为一种文字复制技术,是由一块整版雕印而成^[7]。整个印书过程包括写版、刻版、刷印、裱褙等工种,其中刻版是整条生产线中的主要工种^[8]。然而,关于雕版印刷工艺流程的官方著书并不多^[9],虽然没有提及宋书版面是如何设计的,但从刻版工序来看,宋刻本版面设计的版框相当于现代出版术语的版式,并且是刻版之前首先确定的设计要素。宋本书页是先请善书之人将文章誊写纸上,校对无误后再转到印版刮板上样。待粘合于木版上的誊写纸干燥之后,便可以准备刻版。把反贴在木板上的字迹笔画或图案线条以外的部分去除,形成阳刻,从而得到木板上的立体线条便于覆纸刷印。因此,规范化的关键在于印版,只要设计好印版规格,便可以完成大批量的印书生产。这种印版规格又直接呈现为宋刻本版面设计中的版框高广,现代通过对其四周边框黑线的测量,可以得到具体的尺度数值。在未敲空的雕版上已经形成了四周明确的边栏黑线,见图2^[10]。无论成书开本如何受到纸张天头地脚的留白影响,宋刻本版式大小的尺度规律主要受限于雕版印书的印版规格。因此,版框高广是宋刻本版面范式设计中决定外部比例的一项重要尺度标准。

陈国庆编著的《古籍版本浅说》^[11]中关于版框的高广有记载:“高广是指版框的尺寸说的。我国目录家著录版框的大小,始见于瞿中溶古泉馆题跋。不过,每举一书,只说到大版、中版而已。至缪荃孙作学部



图2 刊刻后尚未敲空的雕版
Fig.2 Engraving that has not been knocked out after being printed

图书馆善本书目，才用尺寸记版框的高广。此后，版本学家踵而效之，多用营造尺为度量的标准。如涵芬楼影印四部丛刊，在每书的扉页后边，特记原书版框高营造尺若干寸若干分，广若干寸若干分。但营造尺不如公尺之精确且通行，今后图书馆著录，以采用公尺为便。”由此可知，宋刻本刻版生产的用尺标准多以营造尺为度量标准。然而，营造尺不仅用于土木工程、金石制作、田地丈量等，在《宋史·舆服志》中述及“官印”的尺寸规格时，也是按营造官尺计量的。其兼有测量长度和角度的标准计量矩尺，也称“曲尺”，还有专门确定水平的直尺等特殊用尺。那么，宋代营造尺的种类多，用尺范围广，具体何种尺才是雕版印刷生产的用尺标准呢？度量衡的法制大全在中央，营造尺的度量标准离不开宋代官尺规格的制约。因此，研究宋刻本版式设计的设计标准，需要在宋代度量衡的尺度语境中寻求其法定度量标准。那么，宋代法定度量衡的标准是什么？宋代手工业生产的度量衡计量单位、进制法则及计量思维又是怎样的？

2 宋刻本版式设计的基本用尺

2.1 宋代尺度系统

宋刻本依据刻书者，可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依据刻书地，可分为浙刻本、建刻本、蜀刻本等；依据刻版情况，有修补本、巾箱本等；依据印刷方法，又分为初印本、后印本等类型。再加之，北宋刻本多是基于五代印版，因此解析宋刻本版式设计的设计尺度规范，需要对宋代尺度系统综合考究。

宋代尺度系统就其制造发行、主要用途和通行范围来分，见图 3（图片来源作者绘制），可归为 3 种类型：一是全国各地日常通用的官尺；二是礼乐与天文等方面专用的特殊尺度；三是某些地区行用或民间惯用的俗尺^[12]。从时间上看，宋代官尺可分为北宋官尺和南宋官尺。北宋使用较多的通行官尺主要有太府尺、三司尺和文思尺，其中，在太府尺和北宋文思尺

中较为常用的官尺还包括官小尺、营造官尺，以及布帛尺等。北宋初年到熙宁四年（1071 年），太府寺是中央常设尺斗秤制作机构，这里颁发的标准官尺有“法式”的职责。然而在大中祥符二年（1009 年）至熙宁末（1077 年）之间，除太府寺之外，三司成为度量衡新的发行渠道，流通的官尺称为三司尺。其中，三司布帛尺极为常用，主要用于丈量赋税征敛布帛绸绢的长阔及数额。虽然三司尺对布帛赋敛及度量衡等的管理实权大于太府寺，但是三司尺的行用时间有限，元丰间撤销三司后，“三司尺”亦渐趋于消匿。到熙宁四年（1071 年）十二月，太府寺所管斗称务，归文思院。一直到大观四年（1109 年），文思尺的规格尺寸主要以太府尺旧制而造。

南宋初，徽宗政和元年（1111 年）诏令，文思院新造的大晟尺由朝廷降付诸路，并逐级给付各州郡及其属县使用。靖康之难，高宗南渡，南宋以浙尺作为新的官尺。可见，南宋官尺主要经历了从大观四年（1109 年）至政和五年（1115 年）前后制定颁行的大晟新尺，到以临安府浙尺尺样制作行用的南宋文思院尺。这种南宋“官尺”或“省尺”，实为“浙尺”。从地域来看，宋代虽由官府制造度量衡，并禁止民间私造，但根据文献与宋尺实物标明，宋代各地区根据自己的需求制造了地方通行的浙尺、淮尺、京尺、福建乡尺等。“官尺者与浙尺同”，本属于地方特殊用尺的临安府浙尺，被用为样尺，升为官尺。浙尺，主要在浙西浙东地区行用；淮尺的行用范围广，不仅包括江北淮南等处，在北方地区亦有使用；京尺，旧汴京等北方地区用尺。其中，浙尺、淮尺与京尺，这三尺均与官尺之间存在比例关系，或兼作通用官尺，而福建乡尺则是一种纯粹的地方用尺。

综上所述，宋刻本版框高广的尺度著述多以营造尺为用尺标准，然而，宋代尺度体系较为复杂，官尺与地方用尺之间存在通用关系，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地方用尺又兼有官尺之制。因此，除了宋代官尺，营造尺、浙尺、淮尺、京尺和福建乡尺等都有可能影响宋刻本雕版印书的生产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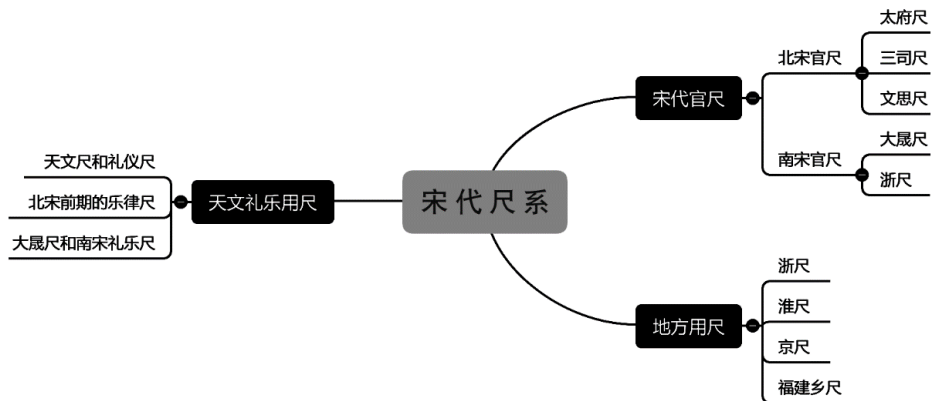


图 3 宋代尺系

Fig.3 The scale system in Song Dynasty

2.2 宋代计量单位和进制法则

我国古代度量衡制定了五个基本长度单位值标准,并规范各级单位以十进制值制的计数法。这种计量方法不仅是夏商时期井田制度的土地区分法,在长度度量上亦有体现。《汉书·律历志》对度量衡单位制作了明确规定:度者,分寸尺丈引也,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汉以降,历代度量衡单位制基本上都是汉制的延续而略有改进^[13]。以分为最小单位值,十进制依次推算,可得到寸、尺、丈、引的量值。宋制承袭隋唐,用尺以十进制制为计数方法,即,一宋尺为十宋寸、一宋寸为十宋分。

本文依据程大昌、王国维、吴大澂、吴承洛、罗福颐、杨宽、曾武秀、郭正忠、丘光明等前辈学者关于宋尺定制的演变及宋尺实物尺度考订的研究,见图4,左图为宋木矩尺,右图为清金殿扬仿宋三司布帛尺(宋浙尺),此尺正当他一尺一寸四分五厘,因此

此尺应是宋代的浙尺^[14]。以丘光明、邱隆、杨平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度量衡卷为准,考订与雕版生产相关的宋代常用尺系,分类如下:宋代官颁太府尺系列在使用中为 31.2~31.6 cm,标准值一尺合今 31.4 cm,一宋寸为 3.14 cm;营造尺,标准值一尺合今 30.9 cm,一宋寸为 3.09 cm;浙尺,标准值一尺合今 27.4 cm,一宋寸为 2.74 cm;福建乡尺,标准值一尺合今 27 cm,一宋寸为 2.7 cm;淮尺,标准值一尺合今 32.9 cm,一宋寸为 3.29 cm。

2.3 宋寸模块尺子

以宋寸为基本单位的十进制计数法是宋代刻版生产和版面设计的计量方法。根据上文对太府尺、营造尺、浙尺、福建乡尺、淮尺,这五套基本尺度度量值的考订,结合十进制的计量方法,笔者建立了基于宋寸模块尺子的网格结构,见图5(图片来源作者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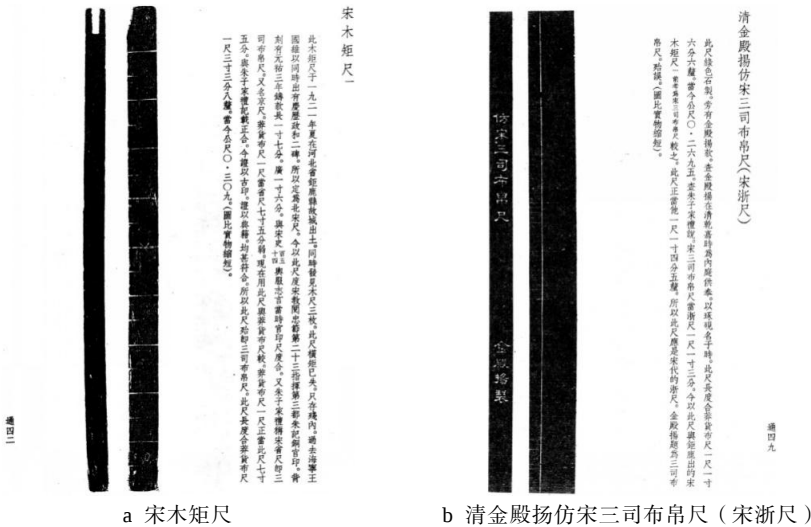


图 4 宋代古尺图录
Fig.4 Song Dynasty ancient ruler char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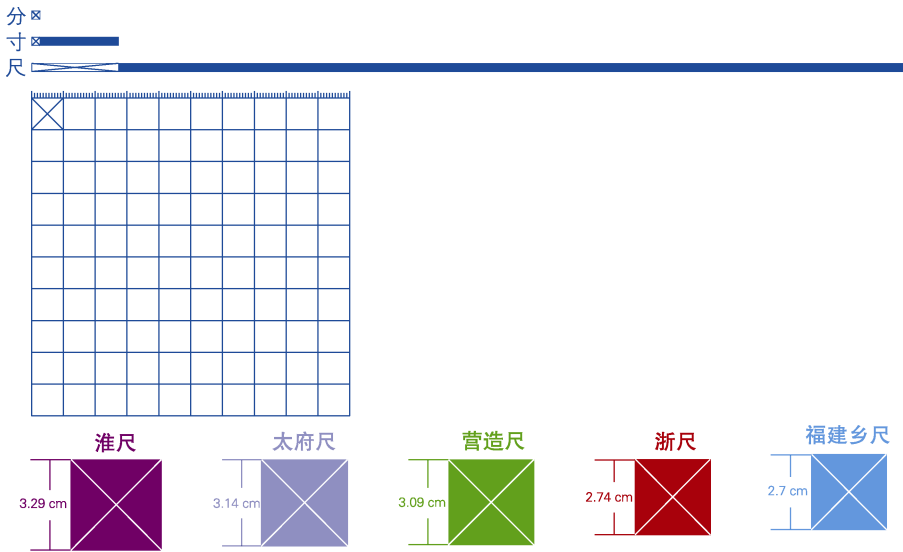


图 5 宋刻本用尺标准及计量方法
Fig.5 The standard and measurement method of ruler for Song Dynasty block printed edition

制)。即,以一宋寸为基本单位,建立1×1的模块网格。宋代尺度的标准化使模块尺子既有精确尺寸,又有相对尺度,可以在任意宋尺单位值下使用。通过以上5套宋寸模块尺子的度量标准,以版式内在分割的界行,及书版外在比例的版框为度量标准,验证不同刻书地域,宋刻本版式设计的用尺标准。

3 宋刻本版式尺度设计的通用性与地域性

宋代刻书地域分布广泛,刻书集中的中心地区主要有开封、浙江地区、福建地区、四川地区、江西地区^[15]。由于北宋刻本传世甚少,宋代刻书中心地区的刻本主要指浙江刻本及浙本系统刻本、福建刻本、四川刻本。以往学者多以字体书风来区分不同刻书中心地区的宋书版面风貌。笔者以南宋传世刻本为主,选取有精确版框尺寸标注的刻本作为视觉材料,从尺度的角度,比较不同地域的宋刻本是否存在一定的尺度联系;比较不同出版机构的刻本是否存在定式规范。通过以宋代不同尺系的宋寸为基本度量单位,建立模块化的网格结构,比对具有精确版框尺寸记载的宋刻本的界行、版框、版口、鱼尾等高广的尺寸关系,从而确定刻本的用尺系统。笔者发现并验证浙江地区的刻本主要以营造尺、浙尺为用尺标准;福建刻本多以营造尺、福建乡尺为用尺标准;四川刻本多以营造尺、浙尺为用尺标准;浙本系统的刻本多以太府尺、淮尺为用尺标准。

3.1 浙刻本的用尺标准

浙江地区的刻本以南宋路级官府刻本、临安坊刻本居多,笔者选取有详细记录刻书机构的浙刻本(含有浙本系统刻本)共计48本。其中有31本均为营造尺的用尺标准:包括两浙路茶盐司刻本7本(《周易注疏》《尚书正义》《周礼疏》《外台秘药方》《事类赋》《礼记正义》《唐书》);临安府刻本2本(《文粹》《汉官仪》);绍兴府刻本2本(《论衡》《春秋左传正义》);新安郡斋刻本1本(《礼记集说》);茶盐司公使库刻本1本(《资治通鉴》卷第八、卷第二百九十、目录卷第八等);府州军县学刻本2本(临安府学《群经音辨》、婺州州学《古三坟书》);家刻本3本(宋婺州市门巷唐宅刻本《周礼》、宋咸淳廖氏世彩堂刻本《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坊刻本12本(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刻本《续幽怪录》、临安府荣六郎家刻本《抱朴子内篇》、金华双桂堂刊刻《梅花喜神谱》),其中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本9本(《甲乙集》《周贺诗集》《朱庆馀诗集》《王建集》《画继》《宾退录》《李丞相诗集》《棠湖诗稿》《才调集》);浙本系统刻本1本(周必大刻本《文苑英华》)。

有13本为浙尺的用尺标准:包括临安府刻本1本(《临安志》);绍兴府刻本1本(《战国策》);茶盐

司公使库刻本2本(《资治通鉴考异》《资治通鉴》目录卷第十四、目录卷第十等);府州军县学刻本4本(绍兴府学《诸史提要》、衢州州学《三国志》、温州州学《大唐六典》、象山县学《汉隽》);家刻本1本(宋四明楼氏家刻本《玫瑰先生文集》);坊刻本1本(《唐女郎鱼玄机诗》);浙本系统刻本3本(周必大刻本《欧阳文忠公集》《重广眉山三苏先生文集》、寻阳郡斋刻本《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

有3本为太府尺的用尺标准:两浙路茶盐司刻本《临川王先生文集》、胡槻江右计台刻本《春秋繁露》、江西漕台刻本《吕氏家塾读诗记》。有2本为淮尺的用尺标准:白鹭洲书院刻本《后汉书》《汉书》。淮尺的用尺标准见图6(图片网格来源作者绘制)。

3.2 建刻本的用尺标准

福建地区的刻本以坊刻本居多,笔者选取有详细记录刻书机构的建刻本共计35本,有20本均为营造尺的用尺标准,这也说明,虽然建官刻本有的是政府出资委托私家或坊间刻印,但其刻书的尺度标准还是以营造尺为规范。具体来看,属于营造尺的建刻本有史部宋淳祐十年(1250年)史季温福州刻元明递修本《国朝诸臣奏议》、史部宋嘉定建宁郡斋刻元明递修本《西汉会要》、史部宋宝庆二年(1226年)建宁郡斋刻本《东汉会要》、子部吴坚福建漕治刻本《张子语录》、子部吴坚福建漕治刻本《龟山先生语录》、子部宋开庆元年(1259)福州官刻元修本《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读书记》、集部宋咸淳元年(1265年)建安书院刻《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子部宋端平元年(1234年)九江郡斋刻本《自警编》、子部宋景定元年至五年(1260年至1264年)环溪书院刻本《新刊仁斋直指方论》、龙山书院刻本《纂图互注春秋经传集解》、史部北宋刻递修本卷三十配宋庆元元年(1195年)建安刘元起家塾刻《汉书》、黄善夫家塾刻本《史记》集解序、王叔边《后汉书》、集部宋蔡氏家塾刻本《李学士新注孙尚书内简尺牋》、经部宋乾道五年(1169年)建宁府黄三八郎刻本《钜宋广韵》(卷第一)、史部建安蔡琪家塾刻本《汉书》、子部建阳龙山书堂刻本《挥麈前录后录》、经部刘氏天香书院刻本《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论语》、史部南宋毕万裔宅富学堂刻本《李侍郎经进六朝通鉴博议》、子部宋刻本《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直解》。

有18本为福建乡尺的用尺标准,并且多是私家和坊间刻本,具体包括经部宋咸淳元年(1265年)吴革刻本《周易本义》、子部宋咸淳福建漕治吴坚刻本《邵子观物》、史部宋庆元四年(1198年)黄善夫家塾刻《后汉书》、集部宋建安黄善夫家塾刻本《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史部宋建安黄善夫家塾刻本《史记》(正义论例溢法解)、集部宋庆元六年(1195年)建安魏仲举家塾刻本《新刊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经部宋开禧元年(1205年)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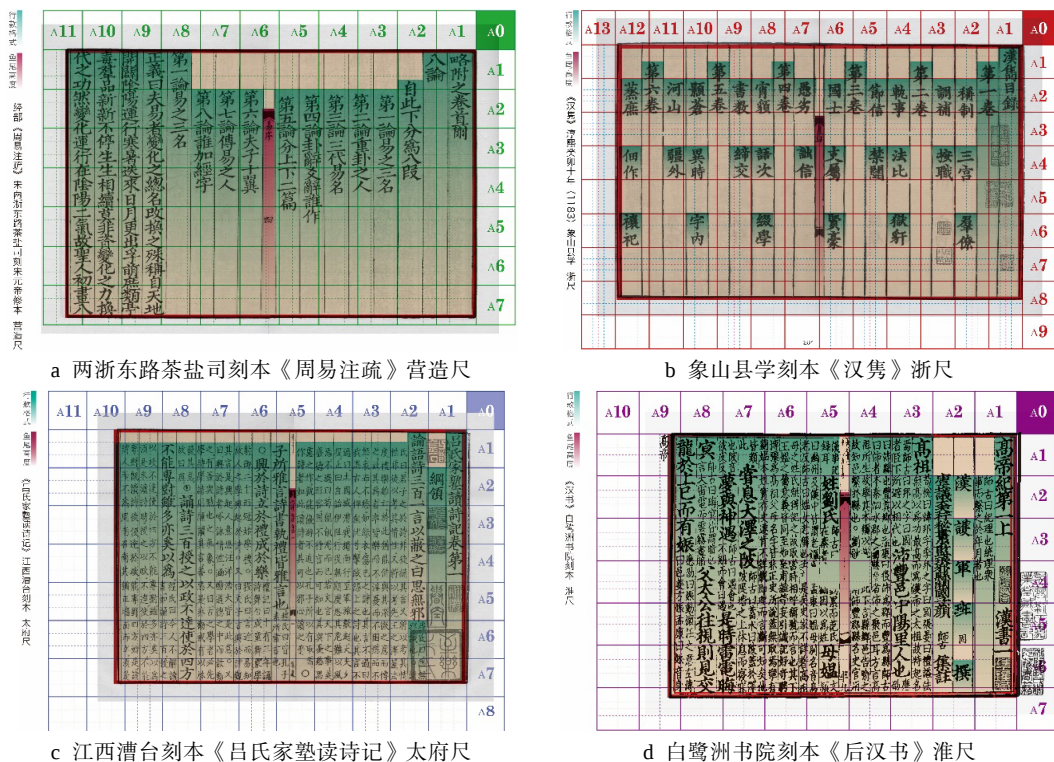


图6 淮尺的用尺标准
Fig.6 The standard of Huai rul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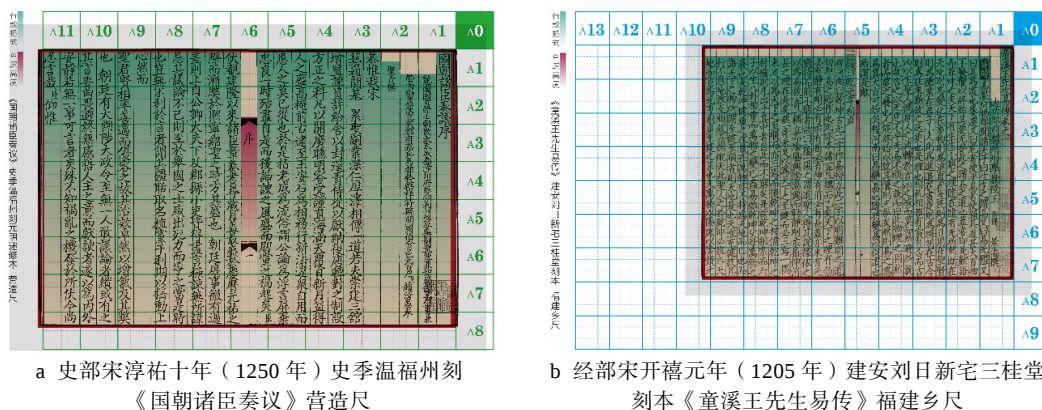


图7 建刻本的用尺标准
Fig.7 Fujian block printed edition with ruler standard

安刘日新宅三桂堂刻本《童溪王先生易传》、史部宋乾道七年（1171年）蔡梦弼东塾刻本《史记集解索隐》、集部宋刻本蔡梦弼刻本《杜工部草堂诗笺》、集部宋乾道麻沙镇水南刘仲吉宅刻本《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集部麻沙刘将仕宅刻本《皇朝文鉴》、子部麻沙刘通判宅仰高堂刻本《纂图分门类题五臣注扬子法言》、建宁府黄三八郎刻《钜宋广韵》卷第四等、经部建安余仁仲万卷堂家塾刻本《礼记》、经部宋绍熙二年（1191年）建安余仁仲万卷堂刻《春秋公羊经传解诂》、集部宋淳祐九年（1249年）建阳刘诚甫刻本《中兴以来绝妙词选》、经部龙山书院刻本《纂图互注春秋经传集解》（论语卷上）、子部宋嘉定三年（1210年）庄夏刻本《东观余论》。建刻本的用尺标

准见图7（图片来源作者绘制）。

3.3 蜀刻本的用尺标准

宋代四川地区的刻本遗存下来的并不多，笔者选取有详细记录版框大小及刻书机构的蜀刻本共计28本。其中23本为浙尺用尺标准，以蜀刻本十二行本居多，具体包括十二行本《李长吉文集》《刘文房集》《陆宣公文集》《新刊权载之文集》《昌黎先生文集》《刘梦得文集》《张文昌文集》《皇甫持正文集》《孟东野文集》《新刊元微之文集》《姚少监诗集》《许用晖文集》《张承吉集》《孙可之文集》《郑守愚文集》《司空表圣文集》《杜荀鹤文集》；蜀刻小字本《嘉祐集》、大字本《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后山居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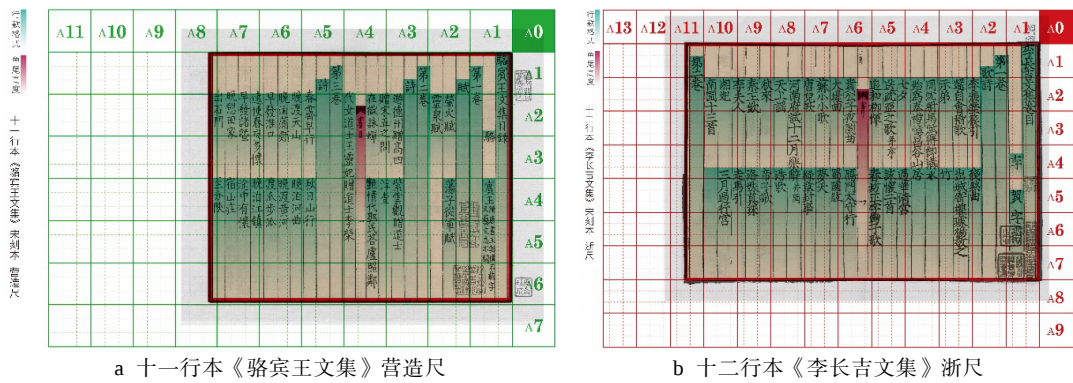


图 8 蜀刻本的用尺标准
Fig.8 Sichuan block printed edition with ruler standard

文集》序、卷第二等；中字本《南华真经》；蜀坊刻书隐斋刻本《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春秋经传集解》。有 7 本为营造尺用尺标准，包括十一行本《骆宾王文集》《王摩诘文集》《李太白文集》；十二行本《孙可之文集》卷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第四等；小字本《三国志》；大字本《后山居士文集》目录、卷第一等；蜀刻本《五百家注音辩唐柳先生文集》。蜀刻本的用尺标准见图 8（图片来源作者绘制）。

4 结果

通过对浙江、福建、四川等地区为代表的宋代刻书中心刻本设计用尺系统的分析，窥探宋代雕版印刷刻版生产的通用性设计规制为尺度标准。其一，浙江刻本主要为路级机构的官方刻本^[16]，笔者从上述案例分析验证，有九成多的浙刻本为营造尺用尺标准。从中窥见宋代官私坊出版系统的版刻之制，或许是以营造尺为主，浙尺为辅的度量标准。当然，在浙本系统刻本中还有太府尺和淮尺的用尺情况。浙本系统家刻本的代表周必大刻本，其刻本的用尺标准多为营造尺。周必大是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由他主持刊刻的诸多刻本很多是受政府之托，由此进一步推测营造尺为宋代雕版印书的官方度量标准。其二，以官刻、私家和坊间刻本分类比较。在笔者所选取 35 本福建刻本里，建官刻本有八成多为营造尺标准，而福建乡尺主要在私家和坊间刻本中使用。因遗存至今的建刻本多为南宋时期的书籍，而福建乡尺的尺度值又与南宋升为官尺的浙尺相近。这种看似官尺与地方乡尺并用的尺度现象，从侧面反映了宋室南渡、人口社会经济随之迁移流动的地缘关系。另一方面，福建地区远离政治斗争中心，社会相对稳定，受限于地方性的民间自治规约，福建乡尺作为私家坊间刻书的用尺标准对宋刻本的版本鉴赏具有一定的参照依据。其三，四川地区的宋刻本存世较少，传世蜀本唐集分为十一行本和十二行本两个系统，其中十一行本皆为营造尺用尺标准，十二行本为浙尺标准。但也有因刻本的卷次不同出现多种用尺的现象，以十二行本《孙可之

文集》为例，序和目录部分为浙尺标准，而卷第一、卷第二等卷次则为营造尺标准。这种混合用尺的结果或许是受不同刻工、不同刊刻时间所影响。因此，宋代尺度系统受南北两宋的政治社会背景影响，不仅从时间上有用尺标准的变化，而且还有地缘性的尺度联系。依据宋代尺度的时空变化，从而推测宋刻本的刊刻年代或刊刻地点，从尺度的视角或许可以作为一条宋刻本版本鉴定的研究线索。

5 结语

随着私有制产生、商业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发展，度量衡从原始测量成为百物制度的技术基础和生标准^[17]。宋代刻本印量大，为保证不同出版机构、不同出版地域版刻生产的通用性，宋刻本版式设计以宋代营造尺为主要的用尺标准。宋室南迁，临安地区的地方浙尺一度成为南宋的官尺标准，地方用尺及官尺之间相互通用。因此，宋代刻书中心地域的刻本版式设计存在多种尺度的用尺标准，呈现地缘性的尺度联系。从技术生产的视域来看，模印之法以印版为准，雕成印版，则摹无穷。印版规格决定刻本版式的版框尺寸，界行长度、界行之间的宽度与版框成比例关系，因此界行与版框是宋刻本版式设计的尺度标准。以设计学和类型学为理论依据，笔者基于宋寸模块网格设计验证宋代刻书中心版式的用尺标准，理解不同地域刻本生产之间的设计规制。

参考文献：

[1] 葛金芳. 南宋手工业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GE Jin-fang. History of handicraft industry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M].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8.
[2] 安德鲁·哈斯拉姆. 书籍设计[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
HASLAM A. Book Design[M]. Beijing: China Youth

- Press, 2007.
- [3] 毛春翔. 古书版本常谈[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MAO Chun-xiang. On the Editions of Ancient Books[M]. Beijing: Zhong Hua Book Company, 1962.
- [4] 杨倩, 许莹, 孙学瑛. 版式设计原理[M].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3.
YANG Qian, XU Ying, SUN Xue-ying. Layout Design Principle[M]. Beijing: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2013.
- [5] 徐蜀. 古籍目录及相关领域应该与时俱进[J]. 北京: 新华书目报, 2018.
XU Shu. Catalogue of Ancient Books and Related Fields Should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J]. Beijing: the Newspaper of Xinhua Catalogs, 2018.
- [6] 叶德辉. 书林清话[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2.
YE De-hui. Discourse on Books[M]. Beijing: Huawen Publishing House, 2012.
- [7] 祝慈寿. 中国古代工业史[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88.
ZHU Ci-shou. Industrial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M]. Shanghai: Academia Press, 1988.
- [8] 周祖赓. 浙江省出版志[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ZHOU Zu-geng. Zhejiang Publishing Records[M]. Hangzhou: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7.
- [9] 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8.
NEEDHAM L.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8.
- [10] 方晓阳, 吴丹彤. 印刷[M].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9.
FANG Xiao-yang, WU Dan-tong. Press[M]. Zhengzhou: Elephant Press, 2009.
- [11] 陈国庆. 古籍版本浅说[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57.
CHEN Guo-qing. The Elementary Introduction of Ancient Books Edition[M]. Shenyang: Liaon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57.
- [12] 郭正忠. 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GUO Zheng-zhong. China's trade-off from the Third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M].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3.
- [13] 丘光明. 中国科学技术史: 度量衡卷[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QIU Guang-ming. The Volume of Weights and Measure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01.
- [14] 罗福颐. 传世历代古尺图录[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57.
LUO Fu-yi. Ancient Ruler Atlas Hand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M]. Cultural Relic Publishing House, 1957.
- [15] 张丽娟, 程有庆. 宋本[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ZHANG Li-juan, CHENG You-qing. Book Publishing in the Song Dynasty[M]. Nanjing: Jiangsu Ancient Book Publishing House, 2002.
- [16] 白寿彝, 陈振. 中国通史 11 第七卷 中古时代 五代辽宋夏金时期 上[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BAI Shou-yi, CHEN Zhen.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1, Volume 7, Middle Ages, Five Dynasties, Liao, Song, Xia and Jin dynasties[M].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5.
- [17] 杨宽. 中国历代尺度考[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8.
YANG Kuan. A Scale of Chinese Dynasties[M].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8.